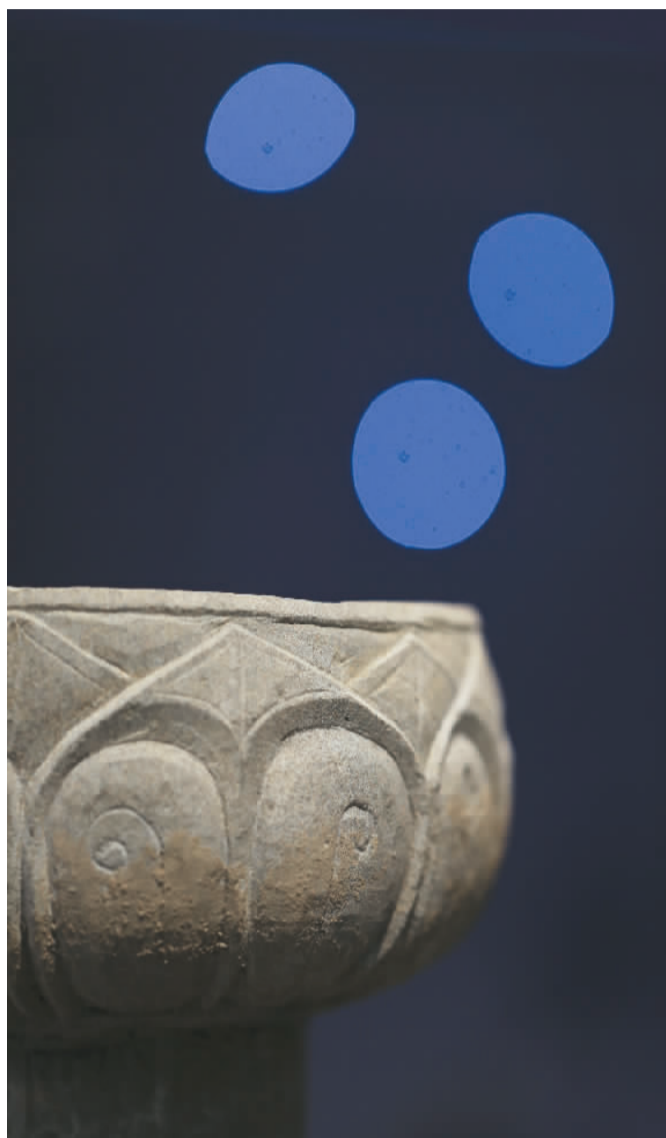


387件(套)文物亮相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 带你感受考古的温度

付明丽 闫雨婷



左图：北魏石灯(局部)。 动脉影像
右上：新石器时代石雕蚕蛹。 山西考古博物馆供图
右下：春秋时期铜鼓座。 山西考古博物馆供图

一群考古人，一年精心筹备，用一个大展，讲述山西“十三五”期间的考古成果。

由山西考古博物馆主办的“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精选387件(套)文物，分为“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自信”“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4个单元。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考古人青灯黄卷、跋山涉水的故事。

探索人类起源奥秘

步入序厅，蓝色背景板上星光点点，每颗星都代表一项考古成果。星空之下，考古工作者开展田野发掘的剪影令人动容。

“十三五”期间，山西共实施228项田野发掘工作，揭露面积达21.4万余平方米，完成3000余件青铜器、牙骨角器、玉石器、陶瓷器的保护修复。

背景板前，静立着大同平城北魏墓出土的石灯，灯上雕刻莲花、忍冬、伎乐人物、龙纹，是平城艺术的精湛之作。“点亮我，温暖你，这件展品与展览主题完美契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说，“不同于一般的文物精品展，这次展览将考古人与他们的工作成果链接在一起，展现了一幅考古工作者的自画像，让观众看到文物背后考古人的热情与坚守，感受到考古的温度。”

展厅前有一孔古老的窑洞，这是从吕梁离石信义遗址搬迁回来的，距今已有4500年历史。走进窑洞，便开启了一场探索历史之旅。

“十三五”期间，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重点围绕早期人类起源、人类行为及其适应方式和现代人起源等问题展开。展览第一单元“延伸了历史轴线”，主要展示了西侯度遗址、丁村遗址、大同李汪洞遗址等最新研究成果。

在襄汾丁村人牙齿化石展柜前，不少观众细细端详。这颗铲形的牙齿为左侧中门齿，齿根从齿颈线到根尖逐渐变细，整体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的牙齿相

近，是考古人员在距今12万年的砂砾层中发现的。

“丁村遗址出土的人类顶骨和牙齿化石一共只有5件，非常珍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石晓润介绍，化石反映了古人类演化、迁徙等方面的信息，也可作为旧石器考古学判断年代的依据。

10余万年前，远古丁村人生活在汾河两岸，以角页岩砾石为毛坯生产石器，用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石球等猎取野生动物为食。展厅里的石器拼合组揭示了丁村人制作石器的工序。“这些石片出土于同一地点，可以拼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可能是打制三棱大尖状器剩下的残片。”石晓润介绍。

兽骨、三角尺、游标卡尺……大同李汪洞遗址考古成果展柜呈现了考古人的工作台：电子秤上放置着需要称重的石器，便利贴上写着未完成的工作事项，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信息。

“考古工作者一年近300天都在野外，要是没有强烈的热爱和坚定的学术信念，真的坚持不下来。”石晓润说。

展示灿烂仰韶文化

第二单元“增强了历史自信”，重点展示夏县师村、临汾桃园、偏关天峰坪、绛县西吴壁、夏县东下冯、闻喜千金耙等地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反映了距今7000—33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璀璨文明。

放大镜下，夏县师村出土的石雕蚕蛹栩栩如生，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石雕蚕蛹之一。“晋南地区是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在山西夏县师村和山西等地发现的石雕蚕蛹和桑蚕茧，不仅表明晋南先民很可能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掌握养蚕缫丝技术，也表明晋南是中国丝绸的发源地之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说。

一个小朋友站在电子屏幕前体验文物修复，用手指拖动碎片，拼合成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瓮，再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陶瓮的花纹、颜色。

据介绍，这件彩陶瓮的原型出土于临汾桃园遗址。这是位于山西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仰韶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仰韶文化彩陶广泛使用连续和对称的图案，流行红黑反衬的表现手法，题材多样。晋陕豫交汇地区盛行的花瓣纹彩陶，绘有组成的花、蕾、叶等，被称为“华夏之花”。

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先民，创造了土构和石构两种建筑形式。展厅中展示了临汾桃园发现的大型五边形土构房屋模型，有专家认为这种房屋可能是公共活动场所。“以前推测五边形房屋的大小可能与聚落大小有关，但近来发现同一个遗址中存在大小不同的五边形房址。这类房址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还需要继续探索。”张光辉说。

考古人员还在临汾桃园、离石德岗发现大量炭化粟、黍种子和石斧、陶刀等农业工具，表明距今5500年左右，山西已形成以粟作为主的成熟农业形态。

阐释山西中原化历程

商周秦汉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向大一统帝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山西经历了晚商方国对峙、晋国称霸春秋，再到秦汉的天下一统。展览第三单元展出了闻喜酒务头、翼城大河口、襄汾陶寺北墓地等出土的文物，这些考古发现，阐释了山西地区中原化历程，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认知。

展厅里，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的3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引人注目。“铜豆的捉手纹路细密，铜盖的花

纹繁而不乱，铜釜体积很大器壁却很薄，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山西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所长武俊华介绍。

春秋中期，晋文公败楚师、盟诸侯，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晋国政治经济实力雄厚，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襄汾陶寺北出土的铜鼓座、镂空铜豆等，代表了当时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展厅里的触屏互动设备带领观众“亲临”考古现场，重温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座贵族墓葬的发掘过程。跟随指引深入墓室，一件件文物铺陈在眼前。“这是春秋时期的铜鼓座，点击屏幕放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蟠龙上的蟠螭纹。”武俊华在互动设备上为记者演示。通过热点按钮，还可以对比观看文物出土时的原始形态和修复后的完整面貌。

一个展柜的上下两排，分别放置着朔州后寨墓地出土的两组器物。上排的5件陶罐体积小，底部“三足鼎立”，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特征。下排的4件陶壶体积较大，底部平坦，属于中原农耕文化代表性器物。

“朔州是汉王朝抵御匈奴南下的战略要塞。后寨墓地不同风格的文物并存，反映了北方边境地区的文化交流。”武俊华说。

呈现鲜活地方史画卷

北朝至明清时期，中国经历了两次民族融合高潮，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山西是北朝核心统治区域、大唐龙兴之地，也是宋元时期北方经济文化重心、明清晋商大放异彩的舞台。展览第四单元汇聚了北魏平城、新绛窑头、河津固镇等地出土的文物，展示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

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集中于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北魏定都平城前后，为填补京畿户缺，多次进行移民，平城逐渐成为4—6世纪中国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展厅里的文物再现了北魏平城多元文化交融的图景：大同云波路出土的金下领托，具有浓厚的萨满教色彩；天泰街出土的陶俑，身着鲜卑风格服饰；贾宝墓出土的四神图像、魏碑书法，体现了中原汉文化。

唐代至元代，山西制瓷业空前发展，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兴县西磁窑沟北宋窑址出土的瓷器，让人眼前一亮。刘岩介绍，这类釉下赭彩装饰的“柿色彩”瓷器，在外观上明显区别于北方地区同类产品，颜色浓艳鲜亮，纹饰自由洒脱，表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

宋金时期，河津因靠近政治中心开封，经济繁荣，瓷器生产达到鼎盛。河津固镇窑窑址的发掘是中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入选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展柜里陈列着河津固镇出土的气代瓷枕，以剔花填黑技法饰花卉纹，黑白相映，气韵生动。

明代实行封藩制，始封山西的晋王朱棣、代王朱桂、沈王朱模。长治史家庄墓地出土的琉璃仪仗俑，墓主人是沈王家族云和郡国的奉国将军朱佑麟。这组琉璃仪仗俑由门神、武士、伎乐等人组成，再现了明代王族出行的盛大场景。

刘岩介绍，“十四五”期间，山西考古将继续围绕“考古中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等重大课题深入开展工作，加大田野考证力度，深化多学科合作，强化成果转化和价值阐释传播，讲好山西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清华艺博推出开年大展 多彩玻璃折射文明之光

本报记者 邹雅婷

神秘瑰丽的眼纹玻璃珠、五彩斑斓的马赛克玻璃饰片、立体生动的磨花玻璃瓶……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特展现场，琳琅满目的展品带给人美的震撼，让人充分领略到古代玻璃艺术的魅力。

玻璃是古代最重要的人造材料之一，由石英砂加上助熔剂和着色剂烧制而成，被誉为“火与沙”的艺术，其价值曾堪比黄金，对古人的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合作举办“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特展，为公众奉上一场文化盛宴。展览以时间为轴，分为“孕育与初生”“传播与融合”“绽放与辉煌”“西方与东方”4个单元，通过约360件(套)古代玻璃艺术品，反映古代科技、艺术和贸易的发展，勾勒出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图卷，体现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性与伟大创造性。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介绍，此次展览是少有的关于古代玻璃的系统展示，展品的时间和地域跨度广，除了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300多件古代玻璃艺术品，还汇集了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品。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玻璃制品出土于叙利亚阿穆克平原的帖耳叶犹底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三千纪早期。从青铜时代开始，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就闪烁着玻璃的光彩，欧亚大陆与北非各地发现各个时期的大量玻璃遗存，从中可窥见各文明之间科学技术、材料工艺、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等要素的传播、演变、交流和融合。

玻璃在中国古代有“琉璃”“颇梨”“药玉”等称谓。从春秋末期开始，玻璃器物和玻璃工艺由陆路、海路传入中原。在消化吸收并融入东方审美和需求后，中国古代玻璃工匠创造出的一系列本土玻璃制品，形成独具特色的东方玻璃工艺体系和艺术趣味，进而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

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中国本土玻璃井喷式发展，特别是以铅钡玻璃配方制作的眼纹玻璃珠层出不穷，常镶嵌于铜镜、带钩、车饰、青铜器等器物上。这类眼纹玻璃珠(俗称“蜻蜓眼”)是战国玻璃艺术的巅峰之作，可见于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

展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马家塬大墓出土的一套黄金组饰。它由兽面纹黄金扣饰、黄金带饰、红玛瑙和多种玻璃饰品等组成，制作精美、绚丽多彩，是目前所见战国时期最豪华的黄金组饰之一。此次展览是它首次公开展出。这组饰品集合了西方眼纹玻璃珠、六棱柱珠、中国本土铅钡眼纹玻璃珠、费昂斯陶杯和汉蓝汉紫珠饰等玻璃元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生动体现。



西汉蓝色弦纹玻璃杯。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莹润光洁的玻璃剑首、剑格，大气典雅的深绿色云纹玻璃璧，近似天然石料纹理的玻璃盘……一组战国、西汉时期的中国风玻璃器，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中国工匠创造性地将东方审美融入玻璃，所制铅钡玻璃大量模仿玉器制品，如玉璧、玉剑首、玉含蝉、玉猪握等，呈现出与西方玻璃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

一件广西贵港西汉墓出土的蓝色弦纹玻璃杯，历经2000多年沧桑，依然散发着美丽的光泽。不同于西方钠钙玻璃和中国北方铅钡玻璃，在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等地，出土了许多钾玻璃制品，反映了当时南方沿海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和南亚往来贸易之繁荣。

史料记载，西方玻璃工艺于北魏初由中亚传入山西大同，在南北朝末期一度失传，至隋代又为何稠复创。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钠钙和铅钡玻璃器可为例证。展厅中有一件来自李静训墓的隋代玻璃瓶，通体绿色，造型流畅，透明度高。李静训为皇室成员，其墓中出土玻璃材质器物共24件，其中有7件玻璃器皿，保存完好。这些玻璃制品印证了《隋书》中关于何稠复烧本土玻璃成功的记载。

此次展览不仅观赏性强，还兼具较强的学术性，通过大量文字和图示详细介绍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玻璃器制作工艺，让观众深入了解有关玻璃的知识。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5日。



北魏玻璃瓶。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大同李汪洞遗址考古成果展柜。 动脉影像